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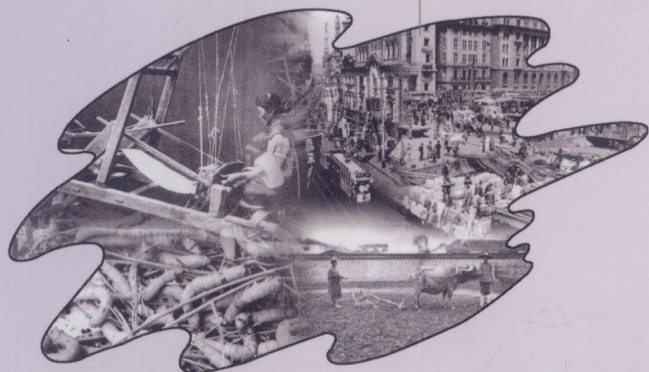
HUI YANJIU CONGSHU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

张丽
著

非平衡化与 不平衡

——从无锡近代
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
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
(1840—1949)



FEIPINGHENGHUA YU
BUPINGHENG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

非平衡化与不平衡

——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
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

张 丽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张丽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0.1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

ISBN 978-7-101-06984-6

I. 非… II. 张… III. 农村经济-经济发展-研究-无锡市-1840~1949 IV. F3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3493 号

-
- 书 名 非平衡化与不平衡
——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
经济的转型(1840-1949)
- 著 者 张 丽
- 丛 书 名 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丛书
- 责任编辑 张荣国
-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规 格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¼ 插页 7 字数 300 千字
- 印 数 1-3000 册
-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984-6
- 定 价 36.00 元
-

鸣 谢

这本书最早的雏形是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学位论文。当时本来是想先出英文版的，而且也做了很多英文版本上的修改。2004年到南开大学工作后，朋友建议可以先出中文版，于是才突然停止了对英文版的修改，并开始了从英文原稿向中文的翻译。然而，要将英文原稿中所引用的中文历史资料返回为原始资料中的中文需要重新做很多工作；这一点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对这本书进行反复的修改，对文中的每一个估算数据都进行了重新计算，并根据新的发现和领悟又或添或减了很多内容。在这本书的整个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老师、家人和同仁们的帮助和支持。他们的鼓励、支持、建议和研究对这本书的完成非常重要。我对他们无限感激。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博士论文委员会的诸位老师：本杰明·艾尔曼（Bejamin Elman）、肯尼斯·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玛丽·耶格（Mary Yeager），和我的导师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尤其是我的导师万志英，在我的学习和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多悉心的指导和建议。这本书的完成无疑凝结着他的心血。作为中国科技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杰出学者，艾尔曼的科技史和社会文化史课程大大地开阔了我的思

路和眼界。每一次跟他的谈话，都使我受益匪浅。他启迪我把经济史中的问题与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的发展联系起来，把经济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发展的历史框架中去考察。索科洛夫和耶格的研究领域是美国经济史，听他们的课总有一种经济学的享受。他们在经济学方法上对我的指导使我受益匪浅，享用终生。特别是肯尼斯·索科洛夫，他既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朋友。从学术问题到学术事业，他从来都是悉心指导、竭力帮助，非常令我感动。然而，特别令我感到难过的是，索科洛夫教授没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我是在2007年5月在台湾开会期间突然获悉他逝世的消息的，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很长时间内，都难以平复自己内心的悲痛。这里，谨让我再一次对索科洛夫教授表达我深切的敬意、哀悼和怀念。

彭慕兰教授是我特别要感谢的另一名学者。第一次读到彭慕兰的《大分流》是在2001年。记得自己当时一气呵成，一下子便喜欢上了那本书。因为那段时间里，我自己正开始对全球经济史产生兴趣，而且也正在思考“资源获得”和“资源替代”在中西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彭慕兰的《大分流》无疑为我的思路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自此后，我不断地从他的研究和跟他的交流中获益。其中的很多灵感和启发都体现在了对这本书的修改中。在此，我对彭慕兰教授致以我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还要感谢黄宗智教授的研究和课程。他的课程为我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有当时莱顿大学的沃德·费米尔（Ward Vermeer），在我在那里做研究和工作期间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宝贵意见。同时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吴承

明先生和李伯重教授的研究。这本书中引用了很多吴老和李伯重教授的研究成果。还有章楷老先生。章楷先生不但给我提了很多建议，还把他未出版的手稿赠送予我。他们的研究对我帮助甚大。当然，需要感谢的还有许多其他的老师和同仁，如范金民教授和王思明教授等，在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然而，本书中的任何疏漏和错误则完全是我个人的责任，与他人无关。此书的出版得到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和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的资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我的丈夫乔治。自始至终，乔治是我最坚实的鼓励者、支持者和帮助者。我对他的感激无以言表。

序（一）

第一次听说张丽在做有关无锡蚕桑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是张丽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的时候。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但对于一个刚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学者来说这也是一个风险极大的题目。因为就明清时期来说，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很多，但资料却很少；而就民国时期来说，虽然有大批资料，但琳达·白尔（Lynda Bell）的著作 *One Industry, Two Chinas*（《一个工业，两个中国》）又似乎已基本上回答了我们的很多问题。然而，张丽不久就在她的博士论文，现在又在她的这本书中证明了前面两个预想的错误。

首先张丽在新资料的搜集上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特别是在有关晚清最后 50 年里无锡蚕桑业发展的新资料的发现上。19 世纪下半叶无锡蚕桑业兴起之前，长时间里无锡并没有桑蚕；明初时期无锡曾有蚕桑生产，但主要是为了满足朝廷诏令的要求；后来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蚕桑生产逐渐被棉纺织业所取代。这里，张丽把她作为一个实证历史学者的扎实工作和一个经济学者的技能出色地结合在了一起，使她能够从很多学者可能会认为意义不大的点滴资料中找出有意义的观点来。当然，类似的观点总是拥有时间上的阶段性，有待于更好资料的发现。

但是，这个分析无疑丰富了我们在那个时期的理解，尤其是我们需要的一些证据长时期以来一直令人懊恼地让人难以捉摸。

更为重要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张丽在她对晚清和民国时期无锡蚕桑业的研究中，向我们证明以往一些我们认为正确的观点可能并不正确。特别是她对无锡满铁调查资料以及前中央研究院和前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调查资料的重新分析，赋予了这些资料新的意义。白尔曾经提出无锡蚕桑业的发展更多代表的是一种蔡亚诺夫式的或者“内卷论”自我剥削式的发展模式；其中，无锡妇女在蚕桑业中获得了就业，但其所获得的边际劳动回报则远小于稻麦种植；由于家庭农场规模的不断缩小和农村就业机会的缺乏，人们甚至接受了虽大于零但却低于生存水平的劳动回报。这个观点一直让人有些疑惑，因为无锡近代蚕桑业兴起于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也就是是在人口和人口对土地压力都大大减少之后。而且无锡临近上海，说无锡农业劳力不存在机会成本问题同样也有些不令人信服。然而，调查资料似乎或多或少地证实了一位内卷论学者有关蚕桑生产边际回报低于稻麦种植的预想；而这似乎只有在我们假定人们真地因缺少就业机会而极度渴望获得尽量多的农业劳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然而，留存下来的调查资料并不完整。一方面一些资料的收集者并非专业人士，另一方面对资料的学术诠释又往往掺杂着个人的选择和倾向。对于这些不完善的资料，张丽既没有摒弃，也没有简单地接受，而是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小心谨慎的重建和调整。特别是通过采用与当时生产相一致、比白尔发现的看起来更合适的价格资料，以及通过对以往一些劳动投入估算

方法的质疑，张丽向我们证实了那些单位劳动收入估算的错误。而且，她还对几位学者对晚清时期蚕桑与水稻生产中单位劳动收入的估算做了相当程度的修订。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发现他人的错误，而是如何尽最大可能接近完美地填补我们资料中所缺失部分的一个艰难尝试。这需要对生产过程和当地市场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了解。例如，当张丽发现一个学者用秋茧价格代替整年的蚕茧价格而指出春茧价格一般要比秋茧价格高时，还有当她指出改良蚕种与土制蚕种的区别时，她改善了我们对事情的重新认识。虽然这些是当时一个农民所熟知的，但对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来说却比较陌生。

在其他情况下，张丽重建了生丝是如何生产的具体过程，并通过将静态化的生产动态化，使我们了解到生产方法会随着价格、技术和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尽管这是明显的事实，手边资料的局限性常常使很多学者忽视了这一点。如果一个人手中缺少关于过去某件事是如何做的详细记录，那么就很容易把一套，比如说农业手册上的记录，当作一个不变的事实，并将其用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价格之下。然而，现实中的人们并不那么死板；比如当产品价格低落时，人们可能就不会再那么多地投入劳动，追求最高产量了。基于这个基本事实，张丽得以解释我们资料中的一些矛盾之处，并纠正了一些乍看起来貌似真实，但却认定在一个价格改变意味着生产积极性改变的世界里人的生产行为会保持不变的分析结果。一个人可以对她的资料填补中的某些细节予以挑剔，但作为一个整体，她所做的是可靠的和重要的，提醒了我们要把市场条件和劳动/生产过程

当作一个互动的体系来看。在她著作里最重要的一部分研究中，她令人信服地推论出从 19 世纪 60 年代一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各年里，无锡蚕桑业的单位劳动收益基本上都高于稻麦耕作，而且在部分年份里远远高于稻麦耕作。

这给了我们一个更令人信服的无锡蚕桑业发展的景象。蚕桑业得以在无锡兴起的直接原因是：蚕微粒子病带给法国和意大利蚕桑业的减产；太平天国战争对浙北传统蚕区的破坏；以及浙北难民对蚕桑技术的传授。之后，随着经济的复苏以及蚕桑业多年来一直高于稻麦种植的劳动产出，人们便待在了蚕桑业。事实上，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的确由于蚕桑业的兴起而提高。虽然蚕桑业的单位劳动净收入在 1925 年时就已跌到了接近与稻麦耕作的水平，但 1929 年后西方对生丝需求的急剧下降和人造纤维对生丝的日益取代才是丝价从此萎靡不振的决定原因（我们现在所说的人造丝最早于 1910 年出现在市场；到 1924 年其被正式命名为人造丝时，其在美国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且价格比生丝便宜得多）。顺乎逻辑，一些人在 30 年代时开始离开蚕桑业。但这并不是一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没有人知道丝价的低落会持续多长时间，加之将桑田转换为稻田又是一件耗资而又费力的事情；所以，尽管连着几年收入惨淡，一些人还是继续待在了蚕桑业。后来，随着日本侵略、国共内战和国内革命的发生，大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没有人会知道假如这些事件没有发生，长期发展的状况将会如何。

在对蚕桑业兴衰的论述中，张丽认为农民自始至终都在理性地对市场作出反应。但是，作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者，她没有由此就得出“市场全能”的简单结论，甚至得出“假如没有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市场就会工作”的结论。就像她颇为正确地指出的，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即便是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不意味着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意味着无锡经济可以由此而转型成为现代经济。她和其他一些学者都曾表明当时并非只有农业部门失调；除了少数几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外，农村经济的现代化有待于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其他部门的转移，而这则取决于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这里值得提醒的是，虽然人口增长带来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但人对食物的需求并不会永远地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特别是当农林业已经提供了人们绝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之后。我们的衣服材料、燃料和建筑材料原都曾来自于植物，而今则大部分来自于矿产。尽管大部分食物依然来自于农业，但其价值中越来越大的部分则产生于农场之外：不管是通过化肥所带来的高产，还是来源于收获后的加工）。这里，她正确地指出没有迹象表明当时所发生的变化足以将无锡——民国时期全国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近期内转化为一个现代经济。所以，她的研究既挑战了某些对民国时期经济发展过于乐观的观点（如罗斯基和布兰德），也挑战了“内卷论”者认为这种增长不是真正发展（体现为单位劳动日收入的稳定增加）的观点（如黄宗智）。

这种对民国时期经济增长肯否相兼的观点包含着很多寓意。最直接的就是有助于我们超越那种过于简单的定性，即在没有澄清概念之前，就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或冠以“成功”或冠以“失败”的标签。这样的评判在冷战激烈的年代里比较普遍是可以理解的：太平洋两岸的学者，无论是现代化理论学派还是某些马克思主义学派都倾向于认为只要有了“正确”的制度，

工业化便会随之而来（当然两者所说的制度并不相同）。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两种经济变化的不同：一种变化是在现有的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下，对一切可能性机会予以充分的利用；另一种变化则是可能性机会本身的根本性变化（用经济学家的术语就是，一个是使社会更接近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生长，一个是将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的生长）。前者可以使部分人的福利得到显著改善；而后者，如果是伴随着不平等的加剧，部分人的福利未必会得到改善，反而有可能会下降。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一个接近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高效率社会不一定就是一个能够把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的社会。与欧洲近代早期的部分地区相比，盛清就是这样的社会；这一点也是李伯重、王国斌、我，还有其他一些学者近年来一直强调的。就民国时期的中国来说，这一点同样重要。

实际上，要对民国时期那些不同类型的增长进行概念上的区分尤其复杂。在清时期，主要是第一种类型的发展（一些学者称之为“斯密型”增长）。但在民国时期，我们看到两种增长类型的因素共存，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尤为如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其他部分地区经济衰退和恶化的明显例子。另外，无论是在历史学还是在经济学上，我们的大部分学术词语都倾向于不是澄清而是模糊这两种增长之间的差异。对于许多学者和其他评论者来说，增长就是增长，而且会随着技术变迁的加速而加速。这种认识往往已成为一种范式，尽管历史上的事实并非如此。这种范式认识很容易导致错误，但张丽却明智地避免了。她既没有把任何增长都当作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的迹象，也不认为缺乏持续和快速的生长就一定是停滞。作为张丽

著作中的故事主体，无锡农户自己本身没有能力足够地改变基本条件，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经济发展之路，但他们尽其所能，做了绝大部分他们可以做的，在长达近三代的时间里改善和提高了他们自己和生活社区的生活水平。这本著作，无论是故事本身还是其局限性，都非常值得了解，而且张丽把这个故事讲得引人入胜详细。

彭慕兰（Kenneth L. Pomeranz）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序（二）

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没有几个问题能像中国传统经济以及其现代命运那样更引人争议了。张丽的这本书无疑是这个研究领域中的另一本重要著作。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小农经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经济环境的变化常常促使农户家庭改变他们的劳动、作物选择、消费习惯以及生产策略的组合。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中国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融入既向中国农民提出了挑战，也向他们呈现了机会。当时没有几个地区像无锡农村那样深受经济大环境变化的影响。作为一个蚕桑业在 19 世纪下半叶突然兴起，后来又深受上海等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地区，无锡无疑是探讨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一个尤为有价值的研究地区。

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在 1992 年亚洲研究会上的主席致词中曾对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经济变化研究中的巨大分歧予以了特别关注。“乐观主义者”，如马若孟（Ramon Myers）、罗斯基（Thomas Rawski）等人认为，中国农村经济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至少到 1937 年之前一直比较繁荣；融入世界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乐观派认为在我国的清晚期，

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中国农民通过专业化和更有效的劳动分工而对市场扩大作出了积极的反应。按照他们的观点，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全球经济，这种市场导向的景象也越来越强。对国际市场的进入、新技术的引进，特别是工业组织和金融的创新带来了 20 世纪前 40 年里的真正经济增长（以劳动和资本生产率的提高来衡量的）。

另一方面，“悲观主义者”，如黄宗智（Philip Huang）和赵冈（Kang Chao）等人认为，中国农民家庭仍然陷在“内卷化”的恶性循环中；其间商业化不但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反而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并且恶化了资本投资的环境。沿着俄国经济学家蔡亚诺夫（Chayanov）的足迹，黄宗智强调农民追求生存的首重性，认为农民对保护家庭基本需求的追求胜过其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在悲观主义者的描绘中，农民会剥削其家中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妇女和儿童劳动力，以增加家庭收入，从而得以满足家庭的生存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投入到手工业，例如纺织业中的边际劳动是极为低效的（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而且会压制企业的投资，因为这种劳动投入降低了手工业产品的价格，致使靠雇佣劳动而存在的企业无利可图。从根本上讲，悲观主义者的模型来源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即人口压力迫使农民增加劳动投入，以致造成边际报酬递减，产生出一个“内卷化”的经济，从而阻碍真正的经济增长。

乐观派的分析存在着两大缺陷。首先，正如费维恺指出的，马若孟等人混淆了斯密型增长与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所提出且已被广泛接受的现代型经济增长。基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 Bin Wong）和李伯重等